

QINGMOMINCHU
WENXUEFANYI ZHONG DE
CHUANGZAOXING PANNI YANJIU

清末民初文学翻译中的
创造性叛逆研究

赵纪萍 一 著

清末民初

文学翻译

创造性

叛逆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清末民初文学翻译中的 创造性叛逆研究

赵纪萍一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末民初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研究/赵纪萍著.
——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209-11112-6

I. ①清… II. ①赵… III. ①文学翻译—研究—
中国—近代 IV. ①I0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35038号

清末民初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研究

赵纪萍 著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 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914
市场部 (0531) 82098027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印 装 山东省东营市新华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16开 (169mm × 239mm)
印 张 13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7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9月第1次
印 数 1-1000

ISBN 978-7-209-11112-6

定 价 3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Contents

目录

导论	1
第一章 清末民初文学翻译活动	18
一、清末民初文学翻译活动	18
二、清末民初文学翻译高潮形成的社会文化语境	24
三、清末民初文学翻译的特点	32
第二章 意识形态与清末民初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48
一、意识形态影响下的创造性叛逆	49
二、“林译小说”中基于意识形态操纵的创造性叛逆	65
三、《哀希腊》早期译本中的创造性叛逆	87
第三章 诗学与清末民初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102
一、译入语文学系统中的诗学形态与文学翻译	102
二、清末民初文学翻译语言的演变及其创造性叛逆	111
三、清末民初文学翻译叙事模式中的创造性叛逆及其对中国 小说叙事模式的影响	131
第四章 清末民初文学翻译对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影响	146
一、文学翻译对中国文学观念的整合与重塑	146



二、文学翻译对中国文学格局现代转型的影响	157
三、文学翻译对中国文学规范现代转型的影响	172
结论	185
参考文献	193

导 论

文学翻译对我国文化和文学的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清末民初的文学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学翻译活动，是中西文学和文化交流的有力见证，这是任何比较文学史、中国文学史都不能忽视的研究领域。然而，清末民初的文学翻译以及其译者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他们由于不忠实于原著而遭人诟病。这种评价和待遇之于译者以及其作品并不公平。要公正客观地评价清末民初的文学翻译，我们需要换个角度，把注意力从文本比较转向那个时期的社会文化语境与文化诉求。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本书选择以清末民初文学翻译活动中形态复杂的“创造性叛逆”为基点，关注清末民初社会文化背景对翻译实践的影响和制约，试图回答这一现象背后更核心的问题。诸如“为何清末民初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如此普遍？”“哪些社会文化因素决定着译者的种种选择？”“这些文学翻译作品为何能在译入语文化里获得足够的生存空间？”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明白不能仅仅通过文字或文学价值来评判一个时期的文学翻译活动及其翻译作品，而是要综合考虑译入语社会文化语境对文学翻译活动的限制和需求。

清末民初，中国文化史上掀起了我国翻译史上第三次翻译高潮。这次翻译高潮从鸦片战争延续至五四运动（1840—1919）。这一时期，西方大量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文学书籍通过翻译这一媒介进入中国社会，开启了中国近代社会现代化进程。比起对域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作品的翻译，文学翻译虽然出现得相对要晚一些，但是却成为这次翻译高潮中最为耀眼的组成部分，而且成就了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文学翻译高潮。学界对该时期文学翻

译的关注由来已久，从民国时期到1949年前，就有研究者对该时期文学翻译有所研究，如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郑振铎的《林琴南先生》、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阿英的《晚清小说史》及《翻译史话》。虽然上述研究成果对此后清末民初文学翻译的研究有着筚路蓝缕之功，但总体来说1949年前的研究多以对翻译家及其翻译活动的一般性介绍为主，对清末民初文学翻译的研究缺乏一定的广度和深度。

新中国成立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出于种种原因对该领域的研究仍然进展缓慢。1981年，钱钟书的《林纾的翻译》一文问世，开启了新时期对该时期文学翻译尤其是小说翻译研究的崭新开端。在研究近代文学翻译的论著中，一些学者对于清末民初的文学翻译给予了专门论述。郭延礼的《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不但对近代翻译文学的总体发展脉络和特点进行了总结，而且对近代文学翻译理论、各体文学之翻译和著名翻译家的译学贡献做了比较全面的论述。陈平原的《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一书中也对“域外小说”的翻译及其影响做了专门的论述——从近代小说翻译的以“意译为主”的方法、“翻译小说的实绩”到翻译小说的功用、类型、艺术特色等方面对文学翻译做了系统的阐释。陈福康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对梁启超、林纾、周桂笙、徐念慈、周氏兄弟等人的翻译活动及翻译思想进行了介绍。颜廷亮的《晚清小说理论》一书虽然主要探讨的是晚清小说的理论发展，但也已经将蠡勺居士、梁启超、林纾、徐念慈、早期鲁迅等的翻译思想纳入其讨论的小说理论体系之中。徐志啸在《近代中外文学关系》一书中从翻译的态度、翻译的动机、翻译的方法、翻译的语言、翻译的标准对近代文学翻译进行了总揽性的论述。李伟的《中国近代翻译史》介绍了传教士的早期翻译及其近代翻译理论的出现。胡翠娥的《文学翻译与文化参与：晚清小说翻译的文化研究》一书重点关注了文学翻译与文化间的互动。王宏志主编的《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英文版和中文版相继于1998年和2000年出版发行，在清末民初文学翻译研究方面开拓了一种国内外合作的新模式，内容更加丰富，研究方向更加细化——有对不同体裁的翻译小说的专项研究，还有对这一时期文学翻译活动的总体概括与介绍，还有对该时期文

学翻译的影响的探讨——对于启发和开阔学者进行文学翻译研究的思路具有启发性的意义。此后,从各个不同角度对清末民初文学翻译的研究如雨后春笋——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近10年有关清末民初翻译的研究论文200多篇,论文数量基本上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在此仅对代表性学者的相关研究进行简要回顾和梳理。

在这些研究论文中,有学者以翻译理论或西方文论为切入点来研究清末民初文学翻译,例如崔波发表的4篇文章:《在权力与知识之间——晚清翻译的内在逻辑》《流动的权力,变动的翻译——晚清翻译出版的另一种视野》《晚清翻译与“翻译的政治”》《晚清意见领袖的变迁——从翻译出版的角度试论》。以福柯的权力观为研究视角关照清末民初文学翻译,分析并揭示权力和翻译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例如刘立、张德让的文章《权力话语理论和晚清外国诗歌翻译》采用权力理论对中国晚清域外诗歌翻译进行分析;李霞的文章《权力话语、意识形态与翻译》在权力话语理论的基础上,初步探讨了意识形态对翻译过程中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与方法的确定的支配作用以及对翻译研究发展水平的影响。还有学者以图里提出翻译规范理论为理论依据分析清末民初的文学翻译中各种情况——例如,谢世坚的《从翻译规范论看清末民初小说翻译》、廖培辉的《规范操纵下的中国近代小说翻译》就是从清末民初近代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的意识形态以及赞助人和诗学对于文学翻译的规范予以探讨;章艳的博士论文《清末民初小说翻译规范研究》更是非常详细地探讨了清末民初文学翻译规范及其对译者译介活动的影响。有学者以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为指导从操控文学翻译的三要素着手对清末民初的文学翻译进行研究——例如王湛的《晚清翻译的赞助问题》分析了赞助人对晚清翻译的影响;李奇志的《初探晚清翻译中译入语语言形式的选择》从诗学观念对文学翻译影响为研究基点论证了清末民初文学翻译中文言译书情况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及其影响;王巍的《操控论三要素对晚清小说翻译政治功利性的阐释》从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操控派的三要素,阐释了晚清小说翻译活动的政治功利性;吴莎、屠国元的文章《论中国近代翻译选材与意识形态的关系(1840—1919)》以安德烈·勒菲弗尔关于意识形态对文本的操控性改写理论为依托,探讨了文学翻译与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还

有学者运用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来研究清末民初文学翻译,例如龚颖芬的《多元系统视角下的翻译文学对清末民初文学的塑造》就是运用多元系统理论分析清末民初的文学翻译活动及翻译文学作品对中国民族文学的重塑;王飞的《清末民初翻译小说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则是用这一理论论证了清末民初小说翻译在多元系统中的位置及影响;都庭芳的《再观多元系统对文学翻译的解释——〈福尔摩斯探案〉在晚清中国的翻译》则是用多元系统理论对清末民初的文学翻译个案进行分析;乔懋的《多元系统论的适用性分析——以晚清翻译文学为例》和黄贵的《从多元系统理论看文学翻译中的意识形态话语——以晚清小说翻译为例》也是运用这一理论关照清末民初文学翻译的研究成果;此外,杨霞的《“中国意识”对清末民初文学想象力的影响》、葛志薇的《环境中的译者——从清末民初的翻译现象看社会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干扰》、韩永芝的《从文化排斥与文化认同看清末外国小说翻译》等则是从宏观层面考察社会文化因素对这一时期文学翻译的影响;蒋天平、段静的《文化霸权下的近代中国翻译》则从文化交流的角度,论述了文化霸权对翻译的决定性影响以及翻译如何抵抗霸权文化的入侵;司佳的文章《从“通事”到“翻译官”——论近代中外语言接触史上的主、被动角色的转移》则研究了当时对翻译人员称谓的变化所反映出的文化交流态度的变化。

还有学者对清末民初文学翻译按照文学体裁和题材的不同进行分类研究,试图通过透视某一类型的翻译文学作品的来研究该时期文学翻译的整体特点,例如李德超、邓静的《清末民初对外国短篇小说的译介(1898—1919)》,袁枫的《清末民初(1891—1917)科幻小说翻译探究》,李丽的《清末民初(1898—1919)儿童文学翻译鸟瞰》,范荣的《从期待视野浅析晚清侦探翻译小说热》,袁获涌的《论清末政治小说的译介》等都属于这一类型的研究成果。还有学者从翻译策略、翻译语言、叙事模式、审美等方面对清末民初文学翻译进行研究,对于指导文学翻译实践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例如赵文静、陈颖的《论清末民初文学翻译中的叙事建构》,邓伟的《试论清末民初文学语言发展及其文化逻辑》《试论清末民初翻译文学语言的归化倾向》《试论清末民初小说翻译的欧化倾向》《归化与欧化——试析清末民初翻译文学语言的建

构倾向》，顾建新的《清末民初文学翻译方法与文学翻译文体发展》和《清末民初文学翻译标准的发展轨迹》，以及高玉的《论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古代性”》等等都是这类型的研究成果。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清末民初这次翻译高潮中涌现了一批优秀的翻译家，因而有很多研究者把目光聚焦在这些翻译家身上，做典型性剖析。其中对林译小说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有研究者对林纾的翻译作品做个案研究，如陈燕的《从〈黑奴吁天录〉看林纾翻译的文化改写》、王伟的《改写理论下林纾的翻译：以〈吟边燕语〉为例》等；还有研究者对林纾的翻译与别人的翻译进行对比研究，例如邹瑞玥的《林纾与周作人两代翻译家的译述特点——从哈葛德小说 *The World's Desire* 说起》、崔文东的《翻译国民性：以晚清〈鲁滨孙漂流续记〉中译本为例》等，此外，对林译小说做宏观研究的也不在少数。1981年，钱钟书《林纾的翻译》一文对林译小说做了深入浅出的评价——一方面，他肯定了林译小说对文学的贡献和对社会的影响；另一方面，他指出，对于林纾翻译中不忠实于原作的增删不能一味地横加指责，而是需要考虑译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译者本人的特殊教育背景而加以公允的评判。复旦大学郭杨的博士论文《林译小说研究》结合林纾的翻译思想及其林纾翻译的文化特点，对林译小说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关于梁启超文学翻译的研究成果也是层出不穷。有对其翻译文本进行细读和对其翻译策略进行研究的，例如李兆国的《梁启超文学翻译作品的文本特征分析》《梁启超文学翻译作品的翻译策略分析》；还有学者从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的互动来解析梁启超的文学翻译实践，例如罗选民的《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论梁启超的翻译实践》。对于苏曼殊、马君武、周桂笙、徐念慈文学翻译活动的研究成果虽然不能与对林译小说的研究成果相提并论，但对这些翻译家的研究却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进展和深入。袁荻涌在其文章《清末译界先锋周桂笙》《晚清文学翻译家徐念慈》中分别对周桂笙、徐念慈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袁荻涌的《苏曼殊文学翻译思想初探》、倪进的《苏曼殊的文学翻译与英国浪漫主义》、李丽的《文学翻译中译者的目的性——苏曼殊翻译〈悲惨世界〉的个案研究》和《文学翻译中译者的读者意识——苏曼殊翻译的个案研究》等研究成果从不同的角度对于苏曼殊的文学翻译予以关照；廖七一的《论马君武译

《哀希腊歌》中的“讹”》，胡冬林、张德让的《论马君武对〈缝衣歌〉的改写》等对马君武的文学翻译作品进行了个案研究。此外，李德超、邓静还在《近代翻译文学史上不该遗忘的角落——鸳鸯蝴蝶派作家的翻译活动及其影响》中特别关注了近代一个特殊的翻译群体——鸳鸯蝴蝶派作家。

除此之外，还有研究者对这一时期的文学翻译做了影响研究。清末民初的文学翻译不仅对于中国民族文学在近代的转型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间接对中国社会造成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这一类型的研究虽然起步略晚一些，但是成果同样丰硕。有的学者专注于这一时期文学翻译在整体上对于民族文学发展的影响，例如肖勇、阮红梅合著的文章《翻译对晚清文学观念的重构》，王伟杰的文章《晚清翻译文学对中国近代小说的影响》；有的学者把研究的焦点放在该时期某一具有重要影响的译者——例如林纾——的文学翻译活动对于民族文学的影响，例如郝岚的《林译小说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陆双祖的《论“林译小说”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韩洪举的《“林译小说”对中国文学语言演变的贡献》以及杨联芬的《林纾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等等。也有研究者探讨了文学翻译对中国文学文体演进的影响，如甘露的《近代戏剧文学翻译与现代戏剧的演变》探讨了戏剧文学翻译所携带的现代戏剧中的异质因子对于中国传统戏剧的影响。鉴于清末民初文学翻译译创界限模糊这一特点，有学者对于该时期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例如上海大学周羽的博士论文《清末民初汉译小说名著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钟俊昆的《近代翻译文学与20世纪初中西文艺交流的影响》，以及兰州大学李琴的博士论文《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互动关系研究》。此外，还有研究者对清末民初的文学翻译与其他国家同一时期的文学翻译进行对比研究，如魏映双的文章《浅析中日近代翻译小说的差异》。

应当说，对于清末民初文学翻译的研究，无论是从著作还是从论文的数量和质量来看，学界都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总的研究特点如下：

第一，已有的研究既有基于宏观视角的整体性研究，也有基于微观视角的针对具体的某部作品或某个翻译家的研究。相比而言，基于宏观角度的研究成果的数量呈现出逐步增长的趋势，而针对具体作品和译者的研究较之从前却有了下降的趋势。

第二,有关清末民初文学翻译的研究成果及其所表现出的研究趋势都指向了文学翻译的文化转型。研究者在关注文学翻译本身的同时,更加注重译入语社会文化语境对于文学翻译实践活动的规约。从分析这些限制性因素来理解这一时期的文学翻译活动,有利于研究者跳出单纯以“翻译忠实观”来评价文学翻译活动的窠臼,有利于研究者得出对于该时期文学翻译活动更加客观公正的认识和评价。

第三,从文学翻译的体裁的分类来看,对于清末民初小说翻译活动的研究成果是最多的,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也更胜一筹。而在对小说翻译的研究中对林纾的研究又是最多的,也是最有深度的;当然关于梁启超、周桂笙、苏曼殊、徐念慈、马君武等翻译家的研究成果也不容忽视,而且在逐渐受到研究者关注。虽然清末民初翻译活动中小说翻译独领风骚的地位已成定论,但是其他体裁的翻译也值得进一步地深入研究。另外,对小说翻译的研究也都从宏观方面为切入点,微观方面的研究需要深入。

二

对于清末民初文学翻译活动中创造性叛逆的研究,本书将采用理论探求、实证分析以及描述性比较相结合的方法对该问题予以观照。首先,借鉴哲学阐释学,从宏观层面对创造性叛逆从理论上进行阐发,用哲学阐释学的相关理论来证明创造性叛逆的合法性并从理论上探求创造性叛逆现象大量存在的原因。其次,具体探讨社会文化语境各要素与译者、翻译策略、翻译文本等微观要素的具体关系和相互影响。通过对清末民初这一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下译者的翻译目的、翻译策略、翻译语言以及转换技巧等因素的考察,研究社会文化语境与译者翻译行为的关系,描述该时期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现象,探求其背后的原因及其影响。

“创造性叛逆”是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在其著作《文学社会学》第四部分“消费”的第七章“作品与读者”中首次提出来的。他指出:“如果大家愿意接受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背叛这一说法的话,那么,翻译这个带刺激性的问题也许能获得解决。说翻译是背叛,那是因为

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指语言）；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可以说，全部古代以及中世纪的文学在今天还有生命力，实际上都经过一种创造性的背叛；这种背叛的渊源可追溯到16世纪，此后又经过多次变动”^①。埃斯卡皮认为，这种背叛可能发生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文学阅读与翻译中，还可能发生在一个国家不同社会集团之间。创造性叛逆是文学接受中的一个普遍规律，是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然而，但“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以及其理论阐述引入中国比较文学界和翻译界以后，它在中国学界引发了非常热烈的反响和激烈的讨论。一些长年从事文学翻译的老翻译家以及在高校长期从事实践翻译教学的教师不能理解，更不能接受“创造性叛逆”的说法，认为“创造性叛逆”是在鼓励，甚至在“教唆”胡译、乱译。他们认为翻译就是要讲究“信”，讲究“忠实”，“叛逆”既然已经是对原文的背离了，怎么还能加上“创造性”这样的美誉？这些学者和翻译家，因为长期以来沉浸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因此在思考问题时总也跳不出翻译实践的圈子，把所有对于翻译的研究、对于翻译的认识和说法都归结为对翻译实践的指导。其实“创造性叛逆”只是埃斯卡皮提出的这一法文术语“*la trahison créatrice*”的对应的中文翻译，是一个中性词，是对翻译中客观存在的现象的客观描述，是用来揭示翻译行为和翻译本质的一个术语，并非是用来指导翻译实践的方法和手段。就译者而言，尤其是一个认真、负责的译者在主观上确实是在努力追求尽可能百分之百地忠实原文，尽可能百分之百地把原文的信息体现在译文中，然而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译文与原文之间必定存在着差距，这些差距在译者的译介过程中受到译入语文化语境中各种因素的影响便会以形态各异的“创造性叛逆”呈现出来。本书题目中的“创造性叛逆”就是这个意义上的“创造性叛逆”。

翻译与阐释学有着天然的联系。西方古代语文学家都是用“翻译”和“解释”来定义阐释学。由此可见，鉴于此，可以用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为

^① [法] 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王美华、于沛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37页。

理论基础对创造性叛逆进行理论阐发。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语言符号之间的单纯的技术转换,而是涉及两种语境中的意识形态、诗学以及其他一些文化因素的一种相互理解和融合的话语行为。理解者的前理解造成了译介中的创造性叛逆,而植根于一定历史文化语境的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则是两种文化视域融合的象征。

在传统阐释学和继承海德格尔阐释学循环思想的基础上,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开创了哲学阐释学。他认为,“理解就是此在的存在方式,因为理解就是存在和‘可能性’”^①。人只要活着就是以“理解”的方式活着。由此可见,阐释学是从理论层面对“理解”的阐发。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是一种主要的“阐释”活动。文本是在阐释中存在的,阐释或理解就是文本存在的意义。然而,如何理解才能真正彰显文本自身的意义呢?对此,伽达默尔是围绕着理解的历史性而展开论述的。他认为,理解文本是带着理解者的前理解与文本展开对话的。每个个体都具有前理解,这是个体所处的特定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的历史文化传统所赋予的,是个体自身的一部分,不受个体的支配却能影响到个体的理解。个体对任何文本的解读都不可能不受到其前理解的影响。前理解就使得个体对文本的意义有了事先的把握,而这种把握影响甚至引导着个体对文本的理解。在文化的交流和他者进行对话的过程中,自我无法撇开自己的前理解。在交流和对话的过程中,自我总是从自身的前理解为基础对他者进行理解和阐释,与此同时自我甚至意识不到其前理解对自己的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前理解在文本理解中的重要影响同样适用于文学翻译活动。伽达默尔对于“翻译”曾经做过如下阐述:“一切翻译就已经是解释,我们甚至可以说,翻译始终是解释的过程,是翻译者对先给予他的语词所进行的解释过程”^②。翻译是由理解阶段和表述阶段这两个阶段构成。首先,译者要理解原文,其次还要用译入语将原文文本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表达出来。这就需要译者同原文文本及其作家进行沟通、交流和对话。当然,受“翻译忠实观”的影响,

① [德]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阐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336页。

② [德]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阐释学的基本特征》(下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496页。

译者都是竭尽所能地尽可能真实地还原源语作品所要传达和表现的精髓，可是这种努力往往是徒劳的。这是因为“翻译都不可能纯粹是作者原始心理过程的重新唤起，而是对本文的再创造，而这种再创造乃受到对本文内容的理解所指导，这一点是完全清楚的”^①。所以，翻译不可能是对原文的分毫不差的再现，而只能是融入了译者前理解的一种阐释。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始终在与原作及原作者进行对话，但是译者不可能避免自身的前理解对翻译这一阐释过程的影响。理解者的前理解使得翻译不可能重现原作者的本意，从而导致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从哲学阐释学的视角来关照创造性叛逆，造成创造性叛逆的主要原因在于理解者本身所无法规避的前理解。既然如此，就有必要对前理解进行深入的研究。前理解的构成要素及其在翻译这一阐释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如何导致创造性叛逆的发生就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首先，要弄清楚前理解的构成要素，以及这些要素中有哪些在翻译中操纵着译者的翻译行为。对此，勒弗维尔（André Lefevere）进行了相关的研究。他指出：“翻译为接触不到‘现实’的原作的读者制造原作的形象。这一形象与原文大不相同，其主要原因并非译者存心扭曲原文，而是因为他们受到了他们所身处的文化的一些特定的限制”^②。“这些限制主要是意识形态、诗学以及经济，其中赞助人‘感兴趣的通常是文学的意识形态’，而‘文学家们关心的则是诗学’”^③。在此，勒弗维尔指出，影响译者翻译行为的前理解的主要构成因素是译入语语境中的意识形态和诗学。意识形态是代表着特定利益集团的理论构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意识形态是由各种意识形式——政治思想、法律思想、经济思想、社会思想、教育、伦理、艺术、宗教、哲学等构成的有机的思想体系”^④。作为译者前理解的主要构成要素之一，意识形态通常是在人们不知不觉中产生影响的。“他（与某种意识形态认同的人）常常志得意满地说：‘我想……’，

① [德] 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阐释学的基本特征》（下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498页。

② Lefevere, André. *Translation and Canon Formation; Nine Decades of Drama in the United States*. Roman; Alvarez & M. Carmen-Africa Vidal. 1996. p. 139.

③ Lefevere, André. *Translating,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p. 14-15.

④ 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1页。

‘我认为……’，‘我发现……’，实际上，这里的‘我’不过是意识形态的代名词，真正的我，即有独立见解的我已经淹没在意识形态的硫酸池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①。由此可见，人不过是意识形态操纵的工具。

勒弗维尔（André Lefevere）曾明确指出：“翻译当然是对原文的改写。所有的改写，不论动机如何，均反映出某种观念和诗学，并以此操纵文学在特定的社会里以特定的方式发挥作用”^②。勒弗维尔在这里明确指出，文学翻译是发生在目的语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客观历史性存在，要受到目的语社会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观念的影响，而且影响更大的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往往操纵译者而导致文学翻译中显在的创造性叛逆。勒弗维尔还进一步指出：“有内外两个因素制约文学创作和翻译。内在因素由评论家、教师、翻译家等‘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构成，外在因素则包括一些‘赞助人’（patronage），主要由拥有促进或阻止文学创作和翻译权利的人和机构组成。‘专业人士’关心的是诗学，而赞助人感兴趣的则是意识形态”^③。“改写者（译者）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操控原文，通常要使原文符合当时主流的意识形态或诗学标准”^④。勒弗维尔还选取了两部作品进行个案分析，以证明文学翻译活动必然要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呈现出或多或少的创造性叛逆。尽管他对于《吕西斯忒拉忒》（*Lysistrata*）和《安妮的日记》（*Dagboeken van Anne Frank*）所做的分析受到不少批评，西奥·赫曼斯（Theo Hermans）等人就曾批评指出：“只有从一个案例跨到另一个案例而没有更深入的挖掘”^⑤，然而，这并没有妨碍他对于翻译受意识形态操控这一观念的例证。勒弗维尔认为，能够丝毫不差地反映原作的文学翻译是不存在的，社会文化体系中的各种因素的操纵会使译者不可避免地对原作进行改写从而导致创造性叛逆的不可避免性。他

① 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② Lefevere, André.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 vii.

③ Lefevere, André.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p. 14-15.

④ Lefevere, André.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 8.

⑤ Hermans, Theo. *Translation in System: Descriptive and System-oriented Approaches Explained*.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9. p. 129.

认为，译者所采用的翻译策略或者说在翻译中实现创造性叛逆的具体方法必然要受到意识形态及诗学观念的影响。而目的语社会的意识形态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发生变化的，因此不同形态的意识形态会导致文学翻译不同的改写方式，进而产生形态各异的创造性叛逆。译文的质量不能以此为评价标准，因为不同时代的译者在译介过程中为了迎合不同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会造成不同的创造性叛逆。

埃斯卡皮指出：“作家都是某一种意识形态的俘虏，都是他那个读者圈的世界观的俘虏：他可以接受这种意识形态，改变它、全部或部分地否定它，但是无法回避它”^①。具体到真实的文学翻译实践活动，意识形态需要通过译者对文学翻译施加影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作为译者前理解的意识形态对译者的翻译活动进行操控和渗透，从而导致了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如果一个社会处于稳定时期，通常会有一种主流意识形态。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形态对译者翻译活动的操纵还是清晰可见的。但是，在社会转型剧变的历史时期，意识形态并不是单一的，实际的情况是各种意识形态相互竞争竭力成为主流。在这种时期，意识形态作为译者的前理解，将在翻译中起到更为复杂的作用，各种意识形态的争斗也使得创造性叛逆的成因更为复杂。

诗学是与意识形态并列的、构成译者前理解的另一主要因素。最早提及“诗学”这一概念的是亚里士多德那一未完成的奠基性著作——《诗学》。自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所说的诗学是指狭义上的“诗学”，也就是“有关作诗法和诗歌创作的要求与建议的汇编，以及通常在某一场文学运动中制定的种种文体标准”^②。随着文学本体地位的确立，“诗学”也逐渐演化为广义上的诗学，即“文学的整个内部原理”^③，用于指涉所有的文类。俄国形式主义语言学家雅各布森更是进一步指出：“诗学的目的首先就是要回答这样

① [法] 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王美华、于沛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27页。

② [法] 达维德·方丹：《诗学——文学形式通论》，陈静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③ [法] 达维德·方丹：《诗学——文学形式通论》，陈静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